

 厦大中文学术文库

王宇
著

国族、乡土
与
性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族、乡土
与性别

王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族、乡土与性别 / 王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5451-9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性别—关系—文化—研究IV. 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042号



出版人 赵利英
责任编辑 艾可
责任校对 张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7千字
定 价 5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引 论 / 1

第一编 乡土与性别

- 第一章 在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启蒙叙事的一个支点 / 19
- 第二章 遭遇乡村 / 34
- 第三章 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 / 49
- 第四章 “空白之页”与“变异转型” / 67
- 第五章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 / 83
- 第六章 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 / 98

第二编 国族与性别

- 第一章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 113
- 第二章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文化象征 / 127
- 第三章 另类现代性：时间、空间与性别的深度关联 / 139
- 第四章 20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外来者故事” / 155
- 第五章 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 / 165
- 第六章 20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 / 179



第三编 女性写作的知识谱系梳理

- 第一章 新时期之初的女性话语及其知识背景反思 / 195
- 第二章 主体性建构 / 208
- 第三章 1990年代性别差异性文化想象的尴尬及其原因 / 220
- 第四章 男性文本：女性主义批评不该忘却的话语场地 / 231
- 第五章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 242
- 第六章 21世纪初年台湾女性小说的文化描述 / 256
- 后 记 / 271

引 论

本书进行的是性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这也是笔者十多年来一直在尝试着的一种研究路径、方法，或者说学术类型。这一研究路径旨在试图从性别的视角重新梳理、阐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主潮^①中所隐含的复杂多变的文化逻辑。它所要处理的命题涵盖性别与近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个人主体想象、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空间、时间、日常生活、身体表述等议题之间的关联性。也许必须提到的是，本人所进行的研究与国内文学研究界自 1980 年代以来流行的女性文学研究之间的似是而非。事实上，这是两种学术类型，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从不同的语境来理解“性别”。女性文学研究只限于两性关系上来理解性别，将性别问题理解成只是女性问题，以及女性与男性关系的问题，其文化诉求是解构男性中心性别政治，建构一种注重女性文化、平等和谐的性别政治。无论面对女性文本抑或男性文本，女性文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两性关系。本人的研究当然也承认性别问题首先一定是指涉两性关系，但这只是我研究的起点，不是终点。本人的研究更注重从性别视角介入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探究“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符码、一种象征资源被带入一定历史时期文学主潮所承担的文化象征，甚至知识谱系的生产中，参与到中国文学一系列重要命题的表述中。

① 在本书的语境中，所谓的文学主潮指由不同历史时期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名著”／“经典”以及对它们的解读、接受所共同营建出的文学象征谱系。构成文学象征谱系核心的应该是作品中的形象，文学正是以形象这一特殊的表述方式参与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建构、知识谱系的生产中。这也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地方。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文学始终是时代文化精神建构、知识谱系生产的中心，这是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不可比肩的。但 1990 年代以后这一中心位置衰弱了。



近年来我将这样的研究路径引向乡土文学领域，着重探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是如何通过“性别”这个非常特殊、非常微观的文化符码来想象转型期中国乡村与农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命题。之所以将自己的研究引入乡土文学领域，首先当然是因为乡土文学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叙事形态。随着研究与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乡村”其实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想象自我与世界的原点，无论是民族国家想象、个人主体想象、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空间、时间、日常生活、身体诸种命题的表述，都离不开这个原点。因为，从文化诉求的角度而言，百年中国文学所要表达的无非是现代性转型期的中国经验，而近代以来，“乡村即中国的缩影”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本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即乡土经验。如果说，中国新文学是现代转型期中国经验的表达，那么，首先是乡土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乡土想象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原点。

那么，选择性别视角来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原点”是否可能与必要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质化、凝固化的乡土/本土经验，乡土与本土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身份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色彩。经验主体与表述主体的身份包括阶级、性别、族裔、空间等多种变量，正是这些变量及其同其他变量之间错综关系的制约，使得经验呈现出多元复数、变化流动的复杂状态。如果我们把性别、种族和阶级、空间看作文学四大关键词，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中，种族（民族）、阶级、空间（地域）都获得了充分表达，并被作为乡土文学研究的重要关键词。唯独“性别”这一变量语焉不详。那么，近百年乡土文学中，经验主体与表述主体的性别身份是否也对乡村经验及其表达产生深刻影响？这个问题自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以来始终是盲点。尽管乡土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赫分支，成果汗牛充栋，但“性别”这个变量始终无法像阶级、民族、地域那样获得关注。于是，百年中国乡土文学所传达的看似中性化的乡土经验，其实只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同样的，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中看似中性化的“农



民形象”，也只是男性农民的形象。而乡村女性形象即便被论及，也只是作为男性农民形象的补充、延伸，从而忽略了“乡村女性”这个特殊群体其文化身份、经验的独特性。

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也会因为民族、空间、阶层等多重身份的介入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长期忽略乡村叙事（其实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并不缺乏乡村视角，只是女性写作的乡村视角总处于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盲点之中）。而乡土写作中的性别问题更是乡土文学研究者（以男性为主）的盲点。女性主义本土化提倡由来已久，却始终找不到与本土经验的结合点。^①一方面，乡土文学研究很难在方法论层面上接纳女性主义，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话语也很少与包括乡土文学研究在内的其他学术话语对话、互动，这也导致这一学术类型面临资源日益枯竭的危机。而本书的创新、僭越之处恰在于此：一方面将性别视角带入乡土文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将乡土的视角带入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领域，从而在这两种学术类型之间找到一个互动点，谋求为两者都注入新的话语资源。迄今，这样的研究路径无论在乡土文学研究还是在女性主义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都尚未见到。

本书由三编构成。第一编，乡土与性别，也是本书的核心篇章，探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是如何通过性别这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符码来想象、表述转型期中国乡村与农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命题。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与农民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最重要的两类形象，而知识分子与农民/乡村的关系也一直是新文学生生不息的重要命题。根据笔者的研究，尽管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命题有不同的表述，却常见一个共同的表述模式，那就是这一命题常常被纳入两性关系中来展开。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历史阶段几乎都会出现一些涉及知识

^① 当然，乡土并非是西方女性主义与本土经验相结合的唯一有效契合点，但至少是非常重要的契合点。



分子与农民之间两性关系的著名文本。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正是分别选择不同历史时期两组著名文本作为研究个案，来切入这个问题。第一章“在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启蒙叙事的一个支点”，通过对1920—1930年代鲁迅的《在酒楼上》、柔石的《二月》、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及《迟桂花》四篇短篇小说名篇的重新解读，揭示新文学启蒙叙事对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这种独特的两性关系的表述是如何成为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支点。如果说，《在酒楼上》通过对吕韦甫与阿顺之间日常化、肉身化的两性关系书写来彰显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沦丧，那么，这一命题在其他三篇小说中则获得了正面的表述。《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叙述“我”与陈二妹之间的“认别”来使“我”原本被忘却、模糊的知识分子身份渐渐明朗、清晰，《二月》则通过萧涧秋对文嫂、采莲的启蒙、救助完成了萧涧秋的自我角色期待。而《迟桂花》中翁莲的形象俨然是知识男性“我”的多重自我的投射物。乡村女性作为一个“他者”，不是被视为与自我完全疏离和断裂的，就是被作为“自我”的外在投射物。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内蕴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逻辑中。

第二章“遭遇乡村——《黑骏马》、《白狗秋千架》、《小黄米的故事》的互文性”，以1980—1990年代张承志的《黑骏马》、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和铁凝的《小黄米的故事》三个著名文本为例，通过对各个文本自身细节及彼此之间互文性的细读，并联系三个文本所赖以产生的知识背景，以及其中所牵涉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再一次探讨知识分子与农民/乡村关系这一“五四”命题。如果说，《黑骏马》以诗意感伤笔调延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那种将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关系纳入两性关系的叙事传统，那么，无论是《白狗秋千架》还是《小黄米的故事》，则都是对这个传统的戏仿。这样的戏仿不是要诉说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背叛（像许多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而是呈现两者之间的毫无干系。背叛，从来都是相对于忠诚而言的，而毫无干系的两者之间就无所谓背叛。当然，在这两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到底还是发生了一些干系，那就是彼此都想将对方当作可资利用的资源，村妇暖企图将从城里来的知识分子



“我”当作生育健康聪明后代的工具，而画家老白则企图将乡村少女小黄米当作完成“炕头系列”油画的材料。结果谁也没有得逞。这可能是这两篇小说区别于同类题材小说的意义所在。它宣告了知识分子与乡村 / 农民关系这一“五四”以来新文学生生不息的重要命题，也许压根儿就是一个伪命题。

如果说第一、第二章，是从性别的视角切入知识分子与农民 / 乡村的关系这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那么，从第三、第四、第五章，则主要进行乡村女性叙事研究。所谓的“乡村女性叙事”即文学对乡村女性的形象表述，这样的表述不仅指涉乡土文学如何形塑“乡村女性”这个特殊的农民群体，在乡土经验表达中女性的经验是如何被表达抑或被改造、覆盖的，还涉及乡土文学常见的其他一些命题，如乡土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传统乡村文化身份的危机、乡村权力格局的复杂转型等。我们选择赵树理和孙犁这两个自 1940 年代延安文学之后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学中最重要乡土叙事者的文本作为我们讨论的个案。

第三章“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从性别研究、人类学乡村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多重视角来重新解读三仙姑形象所隐含的多重文化隐喻。在现实层面上三仙姑是乡村新旧秩序的双重游离者，转变前的三仙姑固然不属于新秩序，却也游离于旧秩序；而转变后的三仙姑，表面看起来是加入新秩序，但实际上是被迫回归了旧秩序——被改造成“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即回到了“长幼有序”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在文化层面上，三仙姑形象则昭示着现代性叙事所无法命名的传统乡村边缘、暧昧的女性文化形态——三姑六婆文化的命运。这一文化形态在父权传统中固然受到贬抑，但尚能在自在、混沌的乡村世界中获得容身之所。随着乡村现代性运动的加剧，其存在根基日益丧失。三仙姑形象的塑造还与 15—18 世纪欧洲猎巫运动对女巫的表述逻辑，以及现代性对女性身体的监控与改造逻辑密切相关。总之，三仙姑形象可以看作自在混沌、难以被现代性整合的传统乡村文化身份的转喻，表征着一种迥异于现代主体的另类 / 他者主体性。这种另类主体性因与现代性逻辑所定义的主体性（小二黑、小芹所表征的乡村新型主体性）

截然不同，而招致改造、清除。

第四章为“‘空白之页’与‘变异转型’——孙犁乡村女性叙事的复杂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村叙事者中，没有一个人像孙犁那样，持久地将乡村女性作为自己乡村叙事最重要的支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孙犁的乡村叙事就是乡村女性叙事。他一直被认为以塑造单纯美丽而又深明大义 of 乡村女性形象而著称。但实际上孙犁的乡村女性叙事还有鲜为人知的层面。首先是孙犁乡村女性叙事至少有两个“空白之页”。其一，他很少涉及同一时期解放区作家笔下常见的乡村女性争取婚恋自主的题材；其二，在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乡村女性所迸发出来的极致人性美的同时，他极力规避这一特殊女性群体在这场战争中触目惊心的性别罹难。其次，孙犁乡村女性叙事在 1950 年代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异转型，出现一系列迥异于水生嫂类型的相当另类的乡村女性人物。这一切都表明孙犁乡村女性叙事的复杂性。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界已充分意识到孙犁创作的复杂性，但少有人将这种复杂性与他笔下的乡村女性叙事相关联。因为孙犁笔下以水生嫂为代表的乡村女性形象承载着的是我们关于乡村、母亲、家园的最本质化、最不容颠覆的文化记忆和想象，承载着最本质化的中国经验。

第五章为“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 1940—1950 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显然是 1940—1950 年代描写乡村现代性变迁的名篇。而历来研究者所忽略的是，这几个文本对这一历史时期乡村现代化变迁与乡村女性叙事之间深刻的关联性的呈现。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中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的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混沌、暧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第六章“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较宏观地讨论了 20 世纪



之初到 1990 年代有关乡村女性叙事的几种类型，分别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伤痕反思文学中广泛流传的受难知识分子与美丽善良的乡村女性之间的传奇爱情故事、1980 年代前期改革文学中大量涌现的乡村娜拉出走的故事，以及 1990 年代乡土叙事和底层叙事中进城务工的“外来妹”与留守乡村的“留守女”的故事。在这三类主要由男作家讲述的故事中，“乡村女性”形象逐一承担了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建构、激进乡村现代性想象以及乡村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的缩影）的守望等不断变化的文化诉求。如果说，前五章分别选择一个切入点，通过对个体文本的细致分析来讨论性别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符码是如何进入文学作品想象与表述转型期中国的乡村与农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命题中，而且基本上每一章只集中讨论一个问题，那么，本章显然涵盖了多个切入点，更注重宏观的文化逻辑梳理，涉及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乡村现代化变迁、乡村文化传统的守望、女性的乡土经验等有关乡土与性别的多种议题。本章可以看作本编的总结。

正如前文提到的，“乡村”其实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想象自我与世界的原点，无论是民族国家想象、个人主体想象、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空间、时间、日常生活、身体诸种命题的表述，都离不开这个原点。如果说第一编的讨论以这个原点为核心来开展，那么，第二编“国族与性别”，则是以此原点为出发点，从性别视角切入与乡土想象密切相关的诸种议题，如百年文学中的国族想象、时间空间想象、日常生活想象以及新时期之初以男子汉面目出现的个人主体想象等。本编第一章“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讨论对象涵盖了从 19 世纪中叶的王韬、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梁启超、蔡锷、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对未来国族蓝图的想象，到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再到 1990 年代台湾作家施叔青《香港三部曲》对香港身份的想象。通过这一系列在时空跨度上非常辽阔的文本论析，本章旨在表明，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



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 / 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 国族身份建构 / 认同, 实际上充满性别象征隐喻, 换一句话说, 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 / 国族身份的建构 / 想象, 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 而且也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 / 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 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第二章“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 沿着第一章的思路, 但把讨论对象集中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文本上, 进一步揭示性别与国族想象之间的关联性。当然, 为了追溯这一关联性赖以产生的知识谱系与文化渊源, 本章还将研究视角伸入晚清民族国家想象的起源语境中。近代以来, 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规制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 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 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 到 1950—1970 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 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的。总之, 第一、第二两章的讨论, 对性别与国族之间的关联性作了一个点面结合、源流互动的考察, 当然由于文本选择上难免以偏概全, 这样时空跨度巨大的考察可能相当粗疏, 但至少避免了非历史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而言, 民族比较是其现代思想的基本处境,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 (即中华民族身份) 的建构 (nation-building) 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的语境中。因此, 东方与西方这一对空间范畴一开始就被赋予强烈的进化论时间意味, 而被视作和东方与西方这一对范畴同构性的其他空间范畴, 如乡村与都市、内地与沿海、内与外等, 当然也被赋予了强烈的进化论时间意味。一句话,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时间与空间的想象实际上是其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的另一种形式。因此，本书第三、第四章转向讨论与现代民族国家命题密切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的议题，探究性别作为一个符码是如何进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时间和空间的表述中的。

第三章“另类现代性：时间、空间与性别的深度关联”，通过考察“外来者故事”这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近百年的绵延、变异，旨在表明在现代中国象征意义系统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不仅被深刻嵌入中国与西方、内与外、乡村与都市等空间范畴的建构中，还被嵌入另一对空间性范畴——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的建构中。换一句话说，性别符码一直在以自身的文化释义及其和其他范畴之间的复杂纠葛参与到有关时间、空间的表述中。

第四章“20 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外来者故事’——以《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爬满青藤的木屋》、《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延续了第三章的主题，但将对“外来者故事”模式的考察放置在电影领域。以《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爬满青藤的木屋》、《大红灯笼高高挂》四部 1940、1960、1980、1990 年代著名的电影文本为主要讨论对象，指出这四部电影在改编来自小说的“外来者故事”时，格外注重以女性空间位置的变与不变，来暗示传统与现代关系这样的时间命题。在 1960 年代的《早春二月》和 1980 年代的《爬满青藤的木屋》中，女主人公最后都跟随现代文明的使者——“外来者”（男性）出走了，表明现代战胜了传统、文明战胜了愚昧，进化论时间逻辑毋庸置疑；但一旦“外来者”的身份转变为女性——1990 年代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古老陈家大院的“外来者”就是一个新女性颂莲，这个叙事原型就会出现危机，现代性的时间逻辑遭遇颠覆性的瓦解。这三部影片中女主人公的空间位置与这三个时代对现代性或乐观激进或悲观怀疑的态度密切相关。而 1940 年代末费穆的著名影片《小城之春》，则提供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另一种模式：女主人公周玉纹最后没有出走，没有逃离那个禁锢她的传统空间——家，而是留了下来，协助精神和身体状态都有好转的丈夫守



护（也预示着改造）这个传统空间——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象征。现代拯救了传统，而传统也容纳了现代。两者固然有冲突，但很快达成融合。影片的结尾，外来者章志忱独自离去，女主人公搀着丈夫走出戴家花园，走上城墙，朝着远方眺望。象征着封闭的传统空间向现代敞开了可能性，凝固的传统空间欣然接纳了现代性的时间逻辑。这无疑表明战争废墟中人们开始超越激进的二元对立，重新理解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以此重新想象未来的国族蓝图。影片俨然不是一个关于个人情感的故事，而是一个战后的寓言。这再次应验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詹明信那段著名的话：

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

将国族与个人密切结合正是“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中，一旦发现个人的张扬与民族利益相冲突时，个人便被毫不犹豫地放弃。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个人一直被看成民族国家集体主体的危害性力量而招致贬抑。这是导致1950—1970年代文学放逐个人的原因。而如果说，1950—1970年代文学通过对个人主体的放逐来维护民族国家作为绝对、神圣主体的地位，那么，新时期的到来无疑意味着再次将个人还原为民族国家崛起的积极因素。1980年代前期文学主潮对个体性的人的主体身份的建构，对“大写的人”的张扬，都是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换一句话说，新时期文学有关“个人主体”的表述实际上与其国族表述深度纠缠。而如果说任何一个“个人主体”都是有性别身份的，那么，从性别视角来介入这一时期文学中的

① [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个人主体”话语已然是可能的。这正是本编第五章“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一个性别政治视角的考察”的立意所在。本章以1980年代前期“寻找男子汉”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为突破口，从性别的视角介入新时期叙事文本对个人主体、自我的表述，即关于个人主体的话语。^①这一话语其实隐含了深重的性别政治，在这一话语中建立起来的普遍化、中性化的“个人主体”、“大写的人”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性别——男性。对男子汉气概的模塑与个人主体的建构是合二为一的。同时，个人主体身份在相当程度上还被表述为知识男性的主体身份。

第六章“20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选择日常生活这样一种“琐碎政治”作为论题，表面看起来似乎偏离了本编主题“国族与性别”，其实不然。本章实则从一个独特角度来切入本编的主题，因为20世纪文学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关系的表述，恰恰是民族国家与个人关系表述的具体化、细节化。本章拟从性别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文学关于日常生活的话语，这一话语中实际上包含了深重的性别政治。它预设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二者之间的权力等级。而将这种等级关系与男性中心性别阶序挂钩，似乎成了一个普泛性的话语策略——即在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超越的向度始终被指派给了男人，而女人天生就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甚至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1950—1970年代文学对女英雄的修辞也只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贯彻这一话语策略。这一话语策略不仅参与了现代性意义的构建，甚至还参与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如果说前两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主流象征系统（即由不同历史时期被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名著”、“经典”所构建出的象征谱系），而不论这一“名著”、“经典”是出自男作家抑或女作家之手。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构成时代文学主潮的常常是男性文本大大多

① 新时期文学的主体性话语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创造主体（作家）、对象主体（即文学人物的主体性）和接受主体（读者）。本章的论域将局限在第二层面，即只讨论有关文学人物的主体性话语。

于女性文本，这样一来，本书的前两编研究对象自然更多的是男性文本，而第三编“两岸女性话语的知识谱系耙梳”则专门针对女性文本，但在研究方法上依然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女性文学研究，而是延续本书前两编的路径，即不局限于从两性关系层面来理解性别，更注重探究“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符码、一种象征资源被带入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象征，甚至知识谱系生产中，参与到中国文学一系列重要命题的表述中。其实，女性文本也并非只关注女性的或两性关系的议题（如婚姻、家庭、生育），伍尔夫曾说过，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男人描写战争而女人描写生孩子这一事实，而在于两个性别皆表现自身……”^①最优秀的女性写作往往都是超越性别来书写性别，即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重新书写两性共同关注的命题。那么，阐释者就不能只局限于看到女性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女性议题。这也是本编在梳理由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共同构筑的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话语时所秉持的基本学术立场。

第一章“新时期之初的女性话语及其知识背景反思”，在结构上已然有总揽本编第一至第四章的意义。新时期之初文学沿着人性关怀的路线必然延展至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进而导致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境遇在当代文学文本中的历史性出场，但这样的出场路线又宿命般地决定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与生俱来的本质主义的潜在倾向^②。尽管这一波女性主义话语主体也敏感到本质化、刻板化的性别模式、制度对女性个体精神自由的宰制、压迫（如1980年代前期女性小说中常见的“做人与做女人”的两难困境），但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文化语境来支持她们进一步质疑、挑战这种刻板的性别理念。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西方女性主义取代新时期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特殊的本土性别语境还是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对西方女性主

① [英] 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林树明、陈彩霞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页。

② 出于对“文革”极端压抑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左”话语的反拨，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话语对人性的理解偏向于非历史的、本质化的自然属性。